

院士评选岂容拉票之风玷污

李思辉在12月21日《光明日报》撰文提出,近来,围绕院士评选的话题接连不断。对“烟草院士”的关注和争议尚未完全平息,院士评选中的个别不正之风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据报道,多位受访院士称,今年单位取代个人成为“拉票”、“送礼”主体。院士成为地方以及单位的“社会资源”,是单位作为主体出面运作增选的内因。而这,已伤害到“工程院院士”这一群体的社会声誉。院士的头衔,在民众心中更是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因为院士们掌握着尖端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体是我国科技发展的脊梁。正因如此,人们对院士评选保持着热切的关注。今年的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因“部分名单提前出现在网上”、“烟草研究者当选”等一度引发人们的质疑,最近一些院士又站出来公开披露部分候选人所在的地方和单位“拉票”、“送礼”的行为,更是引发了人们的警惕和担忧。院士评选的核心依据,应该是日积月累的学术造诣,是科学技术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在院士评选中,需要以实际成就为依据,而不是看那些朝夕可就的“粉丝”人气。一些地方和单位把选秀“拉票”、“送礼”的那套搬过来干扰院士评选,着实让人感到愤慨。这种不良风气已经严重玷污了院士的圣洁名誉。我们要维护院士的神圣光环,要维护院士的宝贵声誉。对那些干扰院士评选公平公正、损害院士名声的行为和不良风气,应高度警惕,及时制止。

防止文化发展中的两种迷信

李德顺等在《人民论坛》第10期撰文提出,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需要更高度的文化自觉,要注意防止两种“迷信”:一是“市场迷信”。单纯迷信市场,容易导致文化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变得浮躁和浅薄,使“忽悠”成为时尚。这将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低俗化、消费化、短期化、快餐化,压抑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进而形成文化沙漠。二是“话语权迷信”。文化的实力和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掌握话语权,以为占领了话语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头脑,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迷信观念。这种对话语权的迷信容易导致文化圈子化、精神割据、文化宗派主义、圈地运动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化。上述两种迷信表明,我们对当代文化的思想内容、理论方向、科学基础的理解还不到位。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并且一定要坚持以科学、民主、法治为导向。一要注重思想理论体系的深层建设,即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目标的科学化建设。二要注重文化建设路径的选择,摆脱单一的行政化路径依赖,尽可能地创造和选择适合于精神生产规律的新型的文化体制。三要思考在多元思想文化的背景下,怎样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引领作用。

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两个伦理问题

劳凯声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撰文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正面临两个关乎改革伦理的问题:第一,改革应如何坚守公立学校的公立性,现在教育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就是源于我们的公立学校也去谋求自己的私利,这必然会出问题。第二,改革应如何去维护简政放权改革所形成的公立学校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当前正出现某种倒退的倾向。这是两个不同的、有时很难完全兼顾甚至会产生冲突的伦理问题,所以我把它叫做教育改革的两个伦理问题。但这又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要面对并予以解决的伦理问题,既要坚持公立学校办学的公共性质,又要坚持公立学校办学的自主性质,两位一体,缺一不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改革伦理问题的要害大概就在这里。深入理解教育活动的基本价值,准确把握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才能最终提升教育改革的道德水准和改革决策的伦理质量。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不应该是过去的公法学改革思路,也不应该是民商法学改革思路,而应该去寻找新的改革道路。这条新的改革道路必须能够超越上述两种改革思路,能够解决教育改革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能够真正推进中国公立学校的改革。

大学治理不是校长或教授为所欲为

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接受访谈时表示(《高等教育研究》第10期),大学治理,其最大的技巧就在于既要有学术领导人的参与,也要有教师的参与才行。问题在于怎么把这个混合的比例调整好,你肯定不希望有一个为所欲为的校长,也不希望有一批为所欲为的教授。你必须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学术领导人与教授在其中相互合作,共同参与领导与决策,教授们能够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而且双方对最后的结果都感到满意。这里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一切都取决于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这些需要更好的领导力,还需要教师中负责任的人自觉自愿地参与治理。如果有一个决策时从不向教师咨询,习惯于独断专行的校长,你们也不会有一所好的大学。在大学治理中,教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如果他们不信任校长的话,他们就不会参与其中,就不会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大学的成功依赖于从事大学中心工作的教授们自由的和自觉自愿的合作,撰写学术专著和从事教学的显然不会是学术领导人,更不会是政府官员。教授们必须感觉到自己是大学治理的一部分,他们不必作出最终的决定,但他们必须感觉到自己能理解这些决定,并且他们有机会对大学治理做出贡献,同时大学的领导人能够倾听并接受他们好的主张,而不是坚持由自己作出所有的决定。

(责任编辑:韩廷斌)